

更深远更广阔的抵达

□汤素兰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儿童文学作家的写作，大多会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基础，哪怕是写下少年儿童的生活，也往往会以自己的童年经验为参照。然而，当下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变，今天儿童成长的外部环境和所面临的成长困惑都与作家自己的童年时代完全不同，而且瞬息万变，这一切为儿童文学作家如何把握生活，书写少年儿童的成长增加了难度。因此，当许多作家用自己的笔去记录和描写这个时代当下生活中的儿童和童年的时候，艺术上的成功之作并不多。比如众多反映留守儿童生活的作品，除了当时的社会效益和题材内容新颖之外，并不具有更长久的阅读价值和艺术生命力。

在2018年度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有一首校园朗诵诗《今夜，你们是十四岁的王》。这首诗是作家萧萍为上海某中学八年级学生成年礼而量身定作的。这样一首“应景”、“应时”的校园朗诵诗，能得到评委会的认可，其获奖理由，在评委会给出的评语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这是一首关于成长和梦想的少年朗诵诗。全诗视角独特，表现手法新颖，对14岁的少年有充分的理解，同时又不乏长者的诗意提醒。是一首既适合阅读欣赏又可以舞台表演的充满正能量的佳作。极具个性的语言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一代少年提供了一份诗歌范本。”作为儿童文学作品，首先要具有文学性，这首诗的文学性体现在“视角独特，表现手法新颖，极具个性的语言”，还体现在诗歌的形式“既适合舞台表演又可阅读欣赏”；儿童文学是成人写给儿童的、充满了爱的文学，要表达成人对儿童心灵世界的呵护，要助力儿童精神生命的成长，在这首诗中表现为“长者的诗意提醒”和“充满正能量”；儿童文学要有儿童性，适合孩子阅读并且表达作家个人的童年立场，这首诗表现在“对十四岁的少年儿童的充分理解”。同时，这首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是为上海一所外国语学校的孩子们的成年礼而作的，在这首诗中有“网红冰淇淋”、“友谊的小船”、“阿尔法狗”等当下的词汇，有“科技节”、“爱心义卖”等当下的校园生活，同时也有“战火中的叙利亚男孩”、“大凉山那些沉默的贫困和艰难”、“因为白色污染而惊心的河流”、“正在融化的千年冰山”这些当下国内国际的大环境大背景。

这首朗诵诗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为我们儿童文学作家在把握当下生活、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提供了一些启示。反映当下生活的作品，难免会受到一定时代的观念的影响，比如“关爱留守儿童”、“弘扬爱国传统”、“传承良好家风”等等，但这些观念需要抵达生活的现场，用生活中最细微生动的故事和最鲜活的语

言来表达，才能算是文学作品，否则只能是“报告”和“记录”，无法达到文学的丰富和感动。故事可以虚构，而细节必须真实，语言必须鲜活，人物必须丰满。

如果要点评近年来成功的儿童小说，史雷的《将军胡同》一定是不可忽略的作品。为了真实再现当年老北京的的风土人情，尤其是斗蛐蛐的细节，史雷坐出租车的时候，只要发现50岁以上的司机，就会问他们关于斗蛐蛐的事情，在写“蛐蛐”这个细节时，史雷认识一位“老北京”出租车司机，每次史雷去机场，司机来家接他，史雷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山青呢？”如果是冬天，司机就会指指自己怀里说，“刚才还叫呢，欢着呢。”于是这一路上，史雷和司机听着大山青的叫声，谁都不敢说话，那种虔诚，就像在听一位古琴大师的演奏。还有一次元宵节后，史雷出差，司机来接他，史雷还没张嘴，司机的眼圈就红了，“俩铁蛐蛐，不知怎么的，从葫芦里跳出来，怎么也找不着了，昨天晚上我打手电钻到床底下才发现，都死了”。正是这些生动的细节和鲜活的语言，让《将军胡同》这部将家国情怀与趣味童年结合在一起，将诗意悠长与慷慨悲歌结合在一起的作品，成为了近年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罕见的“鹤立”之作。

文学被认为是一个时代的秘史，因此，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说，“从这里所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说明一个作家在把握当下生活的时候，眼光应该更广阔和深远，要从当下的生活现场抵达历史的纵深处，更要抵达人心与人性的纵深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作家要能深入生活，更要能超越生活，对芜杂的生活从更高的立意进行概括，烛照反思，以艺术的方式将纷繁复杂、流动变化的生活进行提炼与加工，深刻挖掘时代精神与人文内涵，使其更具感染力，对读者更有启迪与教益。以刘海栖最新创作的儿童小说《有鸽子的夏天》为例，这部小说是以刘海栖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素材创作的，体现了那个时代民俗风景，那个年代一群男孩子的风貌，有很强的时代感。在那个物质贫瘠、教育缺乏的年代里，在“我们那条街上”，卖肉的郭一刀、卖自行车缝纫机的德惠姨、去看病的曲叔、送煤球的赵理理，他们就像一个连环套，各有各的独门绝技，一个可以制伏另一个，整条街上的成人生活，似乎就是从林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作家在表现现实生活残酷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人性的温暖光芒和正义的最终伸张。正是那个不起眼的送煤工赵理理，一直关注作为一个孩子的“我”的生活，最终让一个孩子相信这个世界不只有丛林法则，还有正义、良善和温情。

儿童文学作家的写作，还要从当下生活出发，抵达童年的深处和成长的远方。我想以我的图画书《五颜六色的一天》来说明这个问题。

《五颜六色的一天》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丽丽的小女孩只喜欢一种颜色：红色。因为她的爸爸在城里开红色的车，只有过年才能回家。有一年，爸爸过年回家的时候给她买了一条红色连衣裙。丽丽很喜欢这条裙子，她也因此喜欢上了红色。她用红色的杯子喝水，睡在红色的被窝里，背红色的书包上学。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丽丽看见了一只红蜻蜓，她去追红蜻蜓。她经过池塘，跑过山坡。她踩倒了山坡上的花儿，她没有注意。她撞翻了灌木丛里的一只鸟窝，把四只毛还没有长齐的小鸟撞倒在地上，她也不知道。直到她一头撞在身穿绿色衣服的邮差身上。邮差递给她一个白色的信封。打开信封，是爸爸的来信。爸爸告诉丽丽，房子租好了，转学手续也办好了，等过了暑假她就可以跟妈妈一起进城，到爸爸身边去读书了。丽丽非常高兴。她往回走的时候，听到树林里喜鹊在唱歌，经过灌木丛的时候，看到四只毛还没有长齐的小鸟掉在地上，她赶紧将小鸟捡起来放回鸟窝里。她经过门前的池塘，看到了满池荷花盛开了，她回到家里，把信念给妈妈听。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窗外深蓝的夜空和满天繁星守护着丽丽和她的梦……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童年故事。它的素材来自于中国众多的留守儿童。因为农村经济欠发达，许多农村的年轻父母离开家乡进城打工挣钱，把孩子留在乡下与老人生活，让他们变成“留守儿童”。随着国家对留守儿童的关心与关注，有许多孩子可以作为农民工的随迁子弟进城读书。但在这个故事里，我不只反映了留守儿童问题，也表达了我对于童年与成长的思考。我用颜色来表达孩子内心对爱的焦渴与对安全感的需要。当一个孩子获得了爱与安全的时候，她的眼睛才能看见五颜六色的世界，她的心才能敞开来接纳外面的世界，并且付出自己的爱。

如果我只是写一个简单的中国留守儿童的故事，我只要写出政策的变化带给孩子生活的变化就完成了。但我以为这是不够的，它并不足以表达我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对于童年与成长的思考。我在表达这个故事的同时，也必须表达我的童年观念——我相信孩子，相信童年的力量。传统的中国童年观念是“长者为本”，成年人天然的是孩子的教导者与引领者，孩子犯了错需要成年人指导与教育，比如这个�故事里的丽丽在奔跑时把鸟窝里的小鸟撞倒地上，这是不对的，是她的鲁莽和不小心。但现代的儿童观念认为，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的儿童，并

不是能被成人任意塑造的一张白纸，也不是需要被驯化的小野马，而是一颗蕴藏了未来一切可能的种子。成人的作用，包括儿童文学的作用，就是能够激发儿童自身的力量，让他们自我成长。因此，我相信丽丽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当她发现小鸟掉在地上的时候，她把小鸟放回了鸟窝里。同时，我也表达了童年权利的重要性：儿童的被爱与安全感，是儿童天生的权利，是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首要条件。就像在这个故事里，丽丽的眼睛里原本只有一种颜色：红色，这种红色如此强烈，遮蔽了她生活中其他一切颜色，但是，当她知道自己很快要和父亲团聚的时候，她获得了爱与安全，于是，她的心敞开了，她的眼睛可以看见五颜六色的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她也能这个世界付出自己的爱——她将小鸟捡起来，放回鸟窝里。

好的童年书写，还需要作家从当下的生活抵达艺术的宽广与无垠。

美国学者诺尔曼·布朗说，“艺术是快乐，艺术是游戏，艺术是童年时代的回复，艺术是使无意识成为意识，艺术是本能解放的一种方式，艺术是共同争取本能解放的人们的精神纽带和亲密关系”。艺术如此，儿童文学当然也是如此。

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儿童文学，吸引孩子的第一个法宝便是“乐趣”。加拿大学者李利安·H.史密斯说：“或许儿童们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喜欢这本书，而排斥那本书，因为儿童的判断力是不好分析的。不过，很明白的可以了解那个根基是在——乐趣。对没有乐趣的阅读，纵使读了，心里还是很很不情愿的。”而让作品“有趣”，需要有生动曲折的故事和那些能充分展现儿童本色的想象、思维、心理、视角、人物、环境和语言。因为有曲折的故事，能充分展现儿童的幻想，《木偶奇遇记》才能超越时代与国界而被全世界的儿童阅读。正因为有了高超的艺术表达和对儿童幻想世界的真切体认，观念先行、旨在批评孩子们“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宝葫芦的秘密》，最终因为作品的“有趣”而战胜了作家的说教观念，成为一代代孩子们喜欢的儿童文学经典。

文学源于生活，但作家不能只做生活的录音笔和照相机，作家在书写当代生活的同时，还需要有透过缤纷的生活现象进行思考，发现历史的进程，或者前瞻理想的光亮的能力，需要用高超的表达技巧和艺术创造力，将琐碎的当下生活进行艺术化呈现。尤其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需要有更深刻而现代的童年立场，更人道而自觉的童年赋权 and 更开阔而真挚的人文情怀。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将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变成故事，将一些“事儿”经过创造性的思考和艺术转化，变成蛹，然后破茧成蝶，飞向精神的宽广与无垠，飞向艺术的宽广与无垠。



直面当下生活与寻求价值不朽，是文学的文化担当与艺术追求。面对巨变的“当下”，儿童文学应紧密追踪当代，表现当代的儿童与生活，又应警惕停滞于其存在实况的、流于表面的呈现；书写“当下”的作品，须力求在当代视野的表达中，留驻具有永恒意义的文字。儿童文学虽有较为明晰的儿童读者意识，但不意味着儿童文学可以简化或弱化自身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她须是承载思想并有所抵达的。这种承载，又不以深邃曲折的意蕴与高超孤绝的技法拒儿童读者于千里之外，而须依托于儿童可触可感的、具象化的“当下”。儿童文学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建构意义，对当代儿童观、儿童问题的启示意义，也维系于此。

“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笔谈”基于儿童文学本体论的探讨告一段落，自本期起，将更多地介入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时代问题，切近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审美探索。湖南师范大学汤素兰教授的《更深远更广阔的抵达》，是基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的思索，更是基于儿童文学研究者的研判，针对止步于概念化复现、缺乏艺术灵魂与思想判断的当下书写，四个“抵达”的提炼，是闪烁个性光彩的“金句”。北京师范大学张国龙教授主持的《巨变的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如何书写儿童》对话，将“当下”做了具象化的聚焦，时代之变，变在哪里，缘何而变，文学又应如何面对。几位年轻的研究者在变与不变的思辨中，探讨了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去向。

——崔昕平

巨变的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如何书写儿童？

□张国龙 俞佳敏 洪 斌 孟鑫岳

张国龙：商品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巨变。毫无疑问，各种媒介、电子产品全方位进入了儿童的生活，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儿童的个性和人格的发展。尽管每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都必然面临因文化语境改变而成长景观各异的难题，但是，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比当下更多元、更芜杂。因此，今天的儿童文学作家试图描摹当下儿童的生活状态，试图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无疑面临巨大的挑战。那么，当下的儿童文学作家该如何直面这样的挑战？

洪 斌：时代的转型带来了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巨变。置身其中的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异质于上个世纪的文化语境。在众多的变化中，我认为最不可忽视的当属“消费文化”和“新媒体”带来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商业化浪潮裹挟而来的消费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消费文化参与构建的“童年观”与“童年亚文化”，正悄然改变儿童生活的特质。与此同时，在其“平面化”和“娱乐化”的大旗下，儿童文学的深度面临消解。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和电子化时代，新媒体作为个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对儿童产生了影响。读图时代、影视冲击、电子阅读等新事物成为了当代童年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新媒体的蓬勃发展更是冲击了传统印刷媒介环境，给儿童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的各个层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总之，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儿童文学写作内容与方式都发生变化的新时代。既给作家带来全新的视野，又给作家带来更大的挑战。

俞佳敏：不可否认，新世纪的到来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契机。市场经济极大地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童年主体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但热闹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市场需求量的迅猛增长使得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缺乏精品意识，趋于单一化、肤浅化。数字媒体时代引发的阅读焦虑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命题，许多孩子沉浸在网络、影视、动漫中，削减了对纯文字作品的阅读热情。如何努力赢得小读者的亲近和回归，是当下儿童文学作家亟待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孟鑫岳：商业化时代，儿童文学正形成以作家为“生产者”，以出版方作为市场主体，经由营销运作来实现市场价值的传播方式。在该传播路径中，儿童文学作品作为特殊文化商品中的商业属性被放大。作家与出版方共同构成了市场中的获利者，也必然是逐利者。但追求畅销并不意味着放弃文学性，儿童文学作家首先是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一员，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儿童文学不仅仅是商品，儿童阅读也不是纯粹的消费行为，儿童文

学必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美育责任。

张国龙：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家需要深入把握时代的脉搏，深入了解成长于电子传媒时代儿童的特质，坚守文学性至上的写作立场，不迎合市场而降低文学品位，才有可能取得文学与市场的双赢。

自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大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少儿图书出版、发行一路高歌猛进。2017年，少儿图书占整个零售市场的比重达24.64%，销售码洋达200多亿元，接近95%的出版社都跻身少儿出版之列。少儿图书出版市场如此火爆，有多少泡沫泛滥？有多少高品质的童书可以流传？儿童文学作家们如何不被市场的喧嚣冲昏头脑，如何能够乘童书出版的煦暖东风书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特有的儿童文学经典？

俞佳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离不开其背后儿童观、儿童文学创作观的支持。曾几何时，教育性成为儿童文学的根本要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一局面得以改变，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和娱乐性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商业化及各种新媒介的介入，却让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剑走偏锋。许多儿童文学作家一味迁就、迎合儿童的口味，降低艺术标准，审美价值甚至被悬置。要想创作出这个时代特有的儿童文学经典，势必要走出“唯儿童主义”和“伪”儿童本位的误区，辨析“优秀作品”、“畅销作品”、“儿童喜欢的作品”、“儿童成长需要的作品”的区别。惟有坚守“有意义”和“有意思”，注重作品内容与主题的复杂性、丰富性，方能建构起当代的童年精神。

孟鑫岳：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写作导致了儿童文学作品的同质化和平庸化倾向，淹没了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作主体性。而拥有“自己的美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是文学“创”造的本质特征。近年来，许多作家盲目模仿J.K.罗琳，比如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幻想文学照搬了“哈利·波特”系列的魔法世界，却忽略了其承载的文化传统，导致模仿之作的“错位感”。由此可见，作家个性的凸显仰赖于深厚的文化底蕴。工业化生产式的文本“复制”，流于“娱乐”的表象化创作，恰好反映了当今儿童文学作家的“文化贫血”。而文学创造中体现的文化厚度不仅要求儿童文学作家在市场的急流中甘于寂寞，沉淀自我，更需要以儿童的视野来实现“文化穿透文学”的写作意旨。

洪 斌：当下儿童文学的创作要想真正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创造时代的经典，还需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多下功夫。纵观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人们耳熟能详的大都是“扁平人物”，其性格固定，易于识别，比如说勇敢的舒克贝塔、淘气的马小跳等。这类人物最为低龄儿童喜爱，最符合幼年与童年儿童的接受能力，确实会受到市场热捧。但是，要成为“新时代少年

儿童精神风貌复杂特征的代言之作”，单靠“扁平人物”是不够的。性格丰富、具有多侧面多层次特点的“典型人物”（圆形人物）同样不可或缺，甚至更为当下的孩子们所渴求——在反映当代青少年成长历程的小说中体现尤甚。凝聚在“典型人物”中的生命维度、情感深度、精神高度，正是其独特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所在。而这显然不是市场数据所能衡量的。

张国龙：审美性、时代性和教育性的有机结合，既有艺术广度，又有文化厚度，还有教育深度，方可成为“经典”，方能让儿童文学真正成为这个时代儿童精神成长的良师益友。

过去、当下和未来，无疑是作家写作的三个时间向度，概莫例外。儿童蓬勃的好奇心和强烈的探索欲，使得他们着迷于“未来”，甚或“玄幻”、“穿越”、“架空”。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善于在自己熟悉的世界里写作，尤其执迷于书写自己成长的时代。显而易见，那些遥远年代的生活场域和陈年旧事，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是陌生的。写过去，如何让当下的孩子引起共鸣？而且，不断变化的成长语境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成人作家与孩子们之间的心理距离，那么，今天的儿童文学作家如何能够切近当下儿童生活的本真，抵达当下儿童的心灵幽宫？

俞佳敏：无论是过去、当下还是未来，能够让孩子产生共鸣的作品总是蕴含着独属于童年的动人故事。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不同于成人的儿童，其生活具有内外两面性。儿童文学作家要做的，其实是一种由外而内的层层剥离——在时代的脉搏中敏感地追寻当下儿童的情感律动。每个人都会经历童年，对广大儿童文学作家来说，面朝童年回忆的乡愁化写作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只沉浸于个人经验中的写作显然是不够的。儿童文学作家应当将私人性的童年生活、情感记忆与当下联结，使其进一步升华为更具有普遍意义和高度的审美经验。借用金波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亲近儿童，发现儿童，思考儿童”。

洪 斌：儿童文学作家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儿童并不是脱离时代、脱离社会的存在。在当前急剧变革的社会中，儿童的现实生活、心理活动和审美观念都发生了改变。拿过去的经验去定性当下的儿童，恐怕有失妥当。作家写“遥远年代”和“陈年旧事”并非不可以，但前提是要紧扣当下儿童的实际需求，写出他们背后的普遍意义，方能引起共鸣。再者，儿童文学作家切忌“老生常谈”，更不能想当然地固守陈旧的“幻想”和“娱乐”手段。我认为，这正是创作出新时代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基础。

孟鑫岳：朱自强教授曾指出，“考察作家对儿童文学有无内在的、无法割舍的精神需求，是检验儿童文学作家的真伪高下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作家对儿童文学的这种精神需求，使其

在创作时回到了儿童的生命状态中。不用担心不同时代的小孩子之间无法沟通，因为儿童的天性是开放的、包容的，儿童的精神世界本质上是共通的，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隔阂。同时，回归儿童生命本真而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对儿童来说，并不会因其遥远年代的书写而显得陌生，反而会激发起其对文本背后“陈年旧事”的好奇，从而赋予作品一定的社会史意义。

张国龙：概言之，写过往，写当下，抑或写未来，只要能引起孩子的共鸣，就是成功。

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如若没有国际视野，便是闭门造车，甚至是夜郎自大。全球化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自然不可孤芳自赏，需要打开窗扉，放眼世界儿童文学的百花园，兼收并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如何将“民族性”和“世界性”完美结合？

孟鑫岳：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放眼世界、兼收并蓄的同时，更应该有“走出去”的野心。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有理由重拾失落已久的文化自信。但是，中国儿童文学的“走出去”应该是顺其自然，或者水到渠成。作家要避免急于求成，将目光放在如何创作出兼具普适性和民族性的原创优质作品上来。

洪 斌：中国儿童文学家在走向世界之前，必须先走向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其题材往往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泥土里。中国的儿童文学首先要吸收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培养中国人才，书写中国特色。在国际化浪潮中，中国儿童文学也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作家需要建立起世界性的儿童文学观，将目光投向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现代课题。在借鉴写作方法，吸收先进理论和观念的同时，中国作家也要小心审视中西文化的差别，找准定位，在世界儿童文学中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俞佳敏：在当今国际化的浪潮中，理解世界，就是更好地审视和理解自己。只有从多维的视点去反思，中国儿童文学才能认清自己的独特性，才能走得更远。我们需要与世界交融，但也应加强文化自信的定力，写出自己应有的风骨和特质。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史长河中，积淀着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应当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借鉴和传承的资源宝库。同西方偏向于幻想型的儿童文学相比，中国的儿童文学更倾向于写实型。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幻想的传统，就没有优秀的幻想作品。薛涛的《山海经新传说》，汤汤的《水妖喀喀莎》等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作品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中国儿童文学的另一种可能。